

DISQUISITIONS ON THE
PAST & PRESENT

古今

論衡

9

上窮碧落下黃泉
動手動腳找東西



DISQUISITIONS ON THE
PAST & PRESENT

古今

論衡

上窮碧落下黃泉
動手動腳找東西



主編
黃寬重

副主編
祝平一 袁國華 王道還

編輯
陳熙遠 戴麗娟

編輯助理
陳淑梅

古今

論衡

【半年刊】

第九期

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《古今論衡》編輯小組

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
ISSN 1561-0594

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出版

本期定價 新臺幣180元

美術編輯：黃義雄

設計排版：美亞平面設計有限公司
TEL: (03) - 3469161 FAX: (03) - 3166229

印刷者：優點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TEL: (02) - 23650718 FAX: (02) - 23656521

國內總經銷：
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話：(02) - 26422629

國外經銷及長期訂戶（含學生優惠）：
樂學書局
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38號10樓之一
電話：(02) - 23219033

目錄

歷史書寫專題

3	Pingyuan Chen 陳平原	「元氣淋漓」與「絕大文字」— 梁啟超及「史界革命」的另一面
23	Jo-Shui Chen 陳弱水	“Writing” and Historical Research
31	Hsiao-t'i Li 李孝悌	Writing History or Collecting Facts? Different Ways of Representing Modern Chinese Rebellions
35	Jen-der Lee 李貞德	Readers Dis/Oriented in Historical Writings: Footnotes in the <i>BIHP</i>
51	Shigehisa Kuriyama 栗山茂久	Openings in the <i>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</i>
59	Senda Minoru 千田稔	Footnotes in Japanese Historical Writing: the Evidence of the <i>Shigaku zasshi</i>

論文

67	張先清	區域信仰的變遷：廉溪中游的漢人宗族與天主教的傳播
89	川端俊一郎	南朝尺的「材」和法隆寺的營造
97	楊明璋	敦煌本〈無名歌〉作者考辨
105	Fabienne Jagou 谷嵐	關於蒙藏事務委員會的初步研究

檔案研究

115	王文基	癲病園裡的異鄉人：戴仁壽與臺灣醫療宣教
125	吳銘能	讀國防部檔案選輯《雷震案史料彙編》

書評

143	顏世鉉	《郭店竹書別釋》讀後
-----	-----	------------

人物

151	傅大為	懷念 Robert K. Merton (1910 - 2003)
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55	編後語	
-----	-----	--

目錄

歷史書寫專題

3	Pingyuan Chen 陳平原	「元氣淋漓」與「絕大文字」— 梁啟超及「史界革命」的另一面
23	Jo-Shui Chen 陳弱水	“Writing” and Historical Research
31	Hsiao-t'i Li 李孝悌	Writing History or Collecting Facts? Different Ways of Representing Modern Chinese Rebellions
35	Jen-der Lee 李貞德	Readers Dis/Oriented in Historical Writings: Footnotes in the <i>BIHP</i>
51	Shigehisa Kuriyama 栗山茂久	Openings in the <i>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</i>
59	Senda Minoru 千田稔	Footnotes in Japanese Historical Writing: the Evidence of the <i>Shigaku zasshi</i>

論文

67	張先清	區域信仰的變遷：廉溪中游的漢人宗族與天主教的傳播
89	川端俊一郎	南朝尺的「材」和法隆寺的營造
97	楊明璋	敦煌本〈無名歌〉作者考辨
105	Fabienne Jagou 谷嵐	關於蒙藏事務委員會的初步研究

檔案研究

115	王文基	癩病園裡的異鄉人：戴仁壽與臺灣醫療宣教
125	吳銘能	讀國防部檔案選輯《雷震案史料彙編》

書評

143	顏世鉉	《郭店竹書別釋》讀後
-----	-----	------------

人物

151	傅大為	懷念 Robert K. Merton (1910 - 2003)
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55	編後語	
-----	-----	--

「元氣淋漓」與「絕大文字」 —— 梁啟超及「史界革命」的另一面



Pingyuan Chen 陳平原

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

談論二十世紀中國的「新史學」，不能不涉及梁啟超等人竭力提倡的「史界革命」。1900年代的中國，在西學大潮激盪下，各種新銳學者紛紛提出革新史學的方案，或開始著手新史的撰述，其中成績顯著的有章太炎、梁啟超、陳黻宸、馬敘倫、夏曾佑、劉師培、曾鯤化等。^①但有一點值得注意，晚清主張史學革新者眾多，可影響最大的，卻非健筆縱橫的梁啟超莫屬。

今人分辨梁氏史學思想淵源，不難發現其對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浮田和民的《史學通論》多有借鑒。大約從1899年起，梁啟超的著述中就可見浮田和民的影響；只不過在《新史學》中，《史學通論》的烙印最為清晰可辨。梁氏並非全盤照抄，撮述中有所調整，而且「敘述更緊湊，條理更清楚，再加上有特色的語言，使讀者感到親切易懂，其效果反較直接翻譯為好」。據說這也是譯本雖多（在1902-1903年間《史學通論》共有六種中譯本），均不若梁文影響大的緣故。^②今人比勘譯本，不難發現梁文雖有所本，但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、發揮——晚清學者並不忌諱「借鑒」，關鍵在於是否「合用」。比如，對傳統中國史學「四弊二病」的批判，便屬於梁啟超的自家心得。

批判「舊史學」，提倡「新史學」，涉及政治立場、民族意識、歷史觀念、著述體例，以及述學文體等。以往談論晚清以降的「新史學」者，多從立場及觀念入手，本文則更看好表述方式。不完全是拾遺補闕，在我看來，「革命」一旦成為「口號」，就不僅僅是時代風氣或思想潮流，同時也是極有感染力的文學表述。這一點，在文人氣很濃的學者兼政治家梁啟超身上，體現得尤為突出。

只是後世研究梁啟超者，分屬不同專業，其對原本血肉豐滿、生機勃勃的任公先生的觀察、判斷與闡釋，多基於自家立場及理論預設，「史界革命」於是與「文界革命」等無涉。而這一分割，無論對於史學史研究，還是文學史論述，都是一大遺憾。因而，本文之鉤稽「梁啟超及『史界革命』的另一面」，既指向史學，也指向文學。

一、「史界革命」與「文界革命」

談論晚清的「史界革命」者，莫不極力推崇梁啟超1902年發表於《新民叢報》上的〈新史學〉，尤其是以下極富感染力的表述：

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，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？則本國史學一科，實為無老、無幼、無男、無女、無智、無愚、無賢、無不肖所皆當從事，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。然遍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，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，給吾所求者，殆無一焉。嗚呼！史界革命不起，則吾

① 參見俞旦初，〈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思潮初考〉，《史學史研究》1982年3、4期。

② 參見蔣俊，〈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《史學通論》〉，《文史哲》1993年5期。

國遂不可救。悠悠萬事，惟此為大！新史學之署，吾豈好異哉？吾不得已也。^①

這段首倡「史界革命」的論述，猶如荒野中的「吶喊」，當年曾激動過無數熱血青年。可如此名言，必須與同年11月發表在《新小說》創刊號上的〈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〉相比照，方能顯示梁氏為文的特色：

欲新一國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。故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說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說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說；欲新風俗，必新小說；欲新學藝，必新小說；乃至欲新人心、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說。何以故？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。……故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說界革命始；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說始。^②

「改良群治」的「悠悠萬事」，到底該惟誰為大，是「史界革命」還是「小說界革命」？梁啟超並未給出明確答案。

再聯繫此前兩年的〈夏威夷遊記〉，其中也有關於「詩界革命」與「文界革命」的提倡。讀讀這些煽情的文字，你會發現，剛東渡日本的那幾年，梁啟超腦海裏充滿各種關於「革命」的想像。1899年底，赴夏威夷途中的梁啟超，在船上暢想中國詩文改革的方案，提出日後被史家再三論述的「詩界革命」與「文界革命」。

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，不可不備三長，第一要新意境，第二要新語句，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，然後成其為詩。……吾雖不能詩，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，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？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，則詩運殆將絕。雖然，詩運無絕之時也。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，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，必不遠矣。

讀德富蘇峰所著《將來之日本》及《國民叢書》數種。德富氏為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，其文雄放雋快，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，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。余甚愛之。中國若有文界革命，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。^③

也就是說，從1899年底到1902年秋，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裏，梁啟超竟然連續拋出四個同樣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「革命」——「詩界革命」、「文界革命」、「史界革命」，以及「小說界革命」。

這是一個需要口號的時代。能夠敏感到思想及學術潮流發展之趨向，將眾多零散的思考凝聚成一個口號，這是一種本事，需要某種「先知先覺」，更需要膽略與氣魄。要說對西學的理解，嚴複遠在梁啟超之上；要說國學的修養，梁啟超也無法與章太炎比肩。可作為思想潮流而被史家再三提及的，首先還是梁啟超的「革命」論述。以一人而包攬晚清四大「革命」的命名權，而且在每場「革命」中

①《新史學》初刊《新民叢報》第1-20號（1902年2至11月），署名「中國之新民」，校訂本收入夏曉虹編校，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梁啟超卷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）。此處引文見夏編校本545頁。

②〈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〉（未署名），刊《新小說》第1號，1902年11月。

③〈夏威夷遊記〉舊題〈汗漫錄〉，初刊《清議報》第35-38冊，1900年2-3月。所引兩則日記分別撰於1899年12月25日和12月28日。

都能以身作則，多有創獲，這實在是個奇跡。只有在晚清這「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」中，才可能出現如此局面。可這同時也提醒我們，此四大「革命」之間，存在某種內在聯繫，並非像日後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樣，有各自獨立的疆界。



梁啟超在日本神戶與華僑吳錦堂等人合影
(第二排中間右手持日本旗者為梁啟超)

言說方式不太一樣，但所謂的四大「革命」，其核心都是「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」，並將其應用到各個專門領域，以改變傳統中國的文學及學術。這一思路，

確實在二十世紀中國佔據主流地位，難怪梁啟超如此簡要的表述，能激起當年以及後世無數讀者的強烈共鳴。可這裏的「革命」云云，只是表達了一種強烈的願望，包括選擇、動力、信心、方向感等。其所以激起如此巨大反響，除了順應西學東漸的大勢，滿足世人破除陳規陋習、尋求救國救民良策的熱誠，還與梁啟超特殊的表述方式有關。年少氣盛（1902年提倡「史界革命」時，梁剛到而立之年），「筆鋒常帶情感」，加上有「傳播文明三利器」之一的報章做後盾，^⑥難怪梁啟超充滿自信，態度十分決絕。以日漸成熟的「新文體」，表達諸多關於「革命」的想像，二者相得益彰。

梁啟超1920年撰成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第二十五節有關於自家「新文體」的描述，常被研究者所引述：

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；幼年為文，學晚漢魏晉，頗尚矜煉；至是自解放，務為平易暢達，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，縱筆所至不檢束；學者競效之，號新文體；老輩則痛恨，詆為野狐，然其文條理明晰，筆鋒常帶情感，對於讀者，別有一種魔力焉。^⑦

根據上下文，這裏的「至是」，指的是《新民叢報》和《新小說》。有這句話墊底，討論「文界革命」者，不必以梁啟超等人的政論自限，起碼可以包括雜記、

⑥ 梁啟超轉述犬養毅的意見，稱學校、報紙和演說為「傳播文明三利器」，參見〈自由書·傳播文明三利器〉，《飲冰室合集·專集》第二冊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36年）。

⑦ 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見夏曉虹編校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梁啟超卷》，頁195。

隨筆、評傳，以及某些史著。這樣一來，所謂的「史界革命」與「文界革命」，也就不可能真的涇渭分明。《新民叢報》第一號「紹介新著」欄對於梁啟超所撰〈李鴻章〉的評價是：「此書以泰西傳記新體，敘述李鴻章一生經歷而論斷之，其體例實創中國前此所未有。」^⑧似這般「前此所未有」的評傳，如〈南海康先生傳〉、〈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〉、〈義大利建國三傑傳〉等，乃談論「文界革命」或「史界革命」者都必須涉及的。

假如「史界革命」與「文界革命」互相溝通這一假設成立，《新史學》之〈論書法〉，便不該被忽略。以往我們多注意其對於傳統的「春秋筆法」的批評，倘若借鑒「文界革命」的思路，則以下這段話大有深意在：

吾非謂史之可以廢書法，顧吾以為書法者，當如布爾特奇之《英雄傳》，以悲壯淋漓之筆，寫古人之性行事業，使百世之下，聞其風者，讚歎舞蹈，頑廉懦立，刺激其精神血淚，以養成活氣之人物。而必不可妄學《春秋》，侈衰鉞於一字二字之間，使之後讀者，加注釋數千言，猶不能識其命意之所在。吾以為書法者，當如吉朋之《羅馬史》，以偉大高尚之理想，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，若者為優，若者為劣，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獲強盛，某時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。使後起之民族讀焉，而因以自鑒曰：吾儕宜爾，吾儕宜毋爾。而必不可專獎勵一姓之家奴走狗，與夫一二矯情畸行，陷後人於狹隘偏枯的道德之域，而無復發揚蹈厲之氣。^⑨

〈論書法〉一節乃梁氏的神來之筆，當初譯介進來的外國史學著作，未見有此名目。此舉既延伸了對於傳統中國史學的批判，也無意中透露了梁氏本人的趣味。本文即從此入手，希望窺探梁啟超「新史學」中不太為人看重的另一面。

二、政論文章與歷史著述

梁啟超所表彰的「書法」，以普魯塔克（Plutarch，46-120/127）和吉朋（Edward Gibbon，1737-1794）的撰述為榜樣，這點很值得注意。關於撰寫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的英國史學家吉朋，除《新史學》外，梁啟超還在〈自由書·不婚之偉人〉、〈新民說〉、〈說常識〉、〈盾鼻集〉中提及，但真正有所論述的，乃撰於1911年的〈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〉：

而我國人愛國心之久不發達，則世界主義為之梗也。吉朋者，英國之良史也。所著《羅馬興亡史》，歐洲有井水飲處匪不誦之。其言曰：「羅馬自征服義大利以後，其人民無複愛國心。彼非不愛羅馬，然所愛者，羅馬之文化，非愛羅馬人，非愛羅馬國也。其人常以保存增長其文化為己任，以擴張其文化施於世界為己任。無論何族之人，有能完成此責任者，則羅馬人奉權力以予之不稍吝，故羅馬歷代帝王，起於異族者居其半。」

⑧ 〈李鴻章〉（無署名），《新民叢報》1號，1902年2月。

⑨ 《新史學》，見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梁啟超卷》，頁570。

至於梁啟超之正面表彰普魯塔克，有〈作文教學法〉、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以及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》等，只是最為精彩的，當推1902年發表的〈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〉——此傳竟五處提及羅蘭夫人閱讀普魯塔克的《英雄傳》。第一次出現時，作者還加了個按語：

按：布爾特奇Plutarch，羅馬人，生於西曆紀元後四五十年頃，其所作《英雄傳》，傳凡五十人，皆希臘羅馬之大軍人、大政治家、大立法家，而以一希臘人一羅馬人兩兩比較，故共得二十五卷。每卷不下萬餘言，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。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量最大，近世偉人如拿破崙、俾士麥皆酷嗜之。拿破崙終身以之自隨，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。¹⁰

前者強調文化對於帝國的超越，欣賞「以保存增長其文化為己任」者；後者則突出傳記之英雄主義氣質，以及「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量最大」。這種閱讀趣味，與西方學者的判斷不無相通處。

克羅齊在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》中提及「從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，許多人為了準備起義和誅戮暴君而讀普魯塔克的著作。」¹¹而湯普森的《歷史著作史》上卷則主張「應當把普魯塔克看作一位道德家，而不應當把他看成歷史家」；因為，「喚醒業已消失的希臘理想主義和對道德的尊重，幾乎是普魯塔克熱情而迫切地追求的目標」。扁平的人物造型以及簡要的敘述，或許不符合現代人的欣賞趣味，「但是從文藝復興到法國革命這段時期，普魯塔克的著作卻極受歡迎。」¹²

同樣是湯普森，在《歷史著作史》下卷，強調吉朋對歷史寫作方法及技巧的探討：「抓住歷史的連續性這個觀點的第一位作者就是他，而且他視野廣闊、學識淵博。」¹³而古奇的《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》則稱：「吉朋的著作在古代世界與近代世界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；它迄今仍是各民族的通衢大道；並在羅馬帝國的其他建築物都久已變成廢墟之後，仍然屹立著。」¹⁴

或許是注意到任公先生對於吉朋的欣賞，半個多世紀前，張蔭麟在大力表彰梁氏的史學著述時，故意將其與「吉朋、麥可萊、格林、威爾斯輩」相比較，而且認定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。¹⁵到底誰該「瞠乎後矣」，這裏暫時不論；要說二者具有可比性，很可能指的是任公先生的學術史著述。傳統的學案體包含學者傳記、言行、著作摘要、相關評論等，尤其重視某一學派的承傳。而梁著在此基礎上，更突出時代風雲、思想潮流、歷史沿革等，尤其關注不同學派間的紛爭，以及各個學術領域的具體成績。若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、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等，確實以其「視野開闊，學識淵博」，以及「在古代世界與近代世界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」最為人稱道。

¹⁰ 梁啟超，〈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〉，《飲冰室合集·專集》第四冊。

¹¹ 克羅齊著、傅仕啟譯，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2年），頁28。

¹² 湯普森著、謝德風譯，《歷史著作史》上卷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8年），頁159-160。

¹³ 湯普森著、孫秉堃等譯，《歷史著作史》下卷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），頁122。

¹⁴ 古奇著、耿淡如譯，《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9年），頁81。

¹⁵ 參見張蔭麟，〈跋〈梁任公別錄〉〉，《思想與時代》4期，1941年11月。

與學術史著述之注重整體感與連續性不同，梁啟超之開創評傳體式，則是以敘事生動、議論精闢，以及激情澎湃著稱。若〈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〉的開篇，當初不知吸引了多少熱血青年：

「嗚呼！自由自由，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，假汝之名以行！」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臨終之言也。

羅蘭夫人何人也？彼生於自由，死於自由；羅蘭夫人何人也？自由由彼而生，彼由自由而死，羅蘭夫人何人也？彼拿破崙之母也，彼梅特涅之母也，彼瑪志尼、噶蘇士、俾士麥、加富爾之母也，質而言之，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，不可不母羅蘭夫人。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，不可不母羅蘭夫人。何以故？法國大革命，為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，羅蘭夫人，為法國大革命之母故。¹⁶

可與此相媲美的，是〈義大利建國三傑傳〉結尾處的「新史氏曰」。表揚過瑪志尼、加里波的、加富爾的赫赫功勳，堅信「吾儕讀史何為乎？察往以知來，鑒彼以誨我而已」的任公先生，忍不住大發宏論：

要而論之，彼三傑之人格，自頂至踵，無一指一發而無可以崇拜之價值。此五端者，不過對吾輩之缺點，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勵云爾。嗚呼！我輩勿妄菲薄我祖國，勿妄菲薄我眇躬。苟吾國有如三傑其人者，則雖時局艱難，十倍於今日，吾不必為祖國憂，彼意大利之衰象凶象險象，夫豈在吾下也。苟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，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，吾不必為眇躬怯。舜何人？予何人？有為者亦若是也。抑意大利有名之三傑，而無名之傑尚不啻百千萬，使非有彼無名之傑，則三傑者又豈能以獨力造此世界也。吾學三傑不至，猶不失為無名之傑，無名之傑遍國中，而中國遂為中國人之中國焉矣。¹⁷

諸如此類的長篇大論，並不限於「開篇」或「結尾」。只要有感觸、能發揮，梁啟超隨時可以擱置敘事，插入洋洋灑灑、駢散相間的幾百乃至上千言的宏論。這與《史記》中蓋棺論定式的「太史公曰」，不可同日而語，明顯是另有淵源。

在1922年所撰〈作文教學法〉中，梁啟超談及「古今中外傳記名手」，舉的是「在歐洲則布魯特奇之《英雄傳》，在中國則司馬遷之《史記》」。¹⁸而此前一年，梁啟超還專門表彰司馬遷「其最異于前史者一事：曰以人物為本位」；這一點，「其價值乃頗類布林達克之《英雄傳》；其年代略相先後（布林達克後司馬遷約二百年），其文章之佳妙同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，亦略同也」。¹⁹

《史記》乃中國敘事文學之祖，稱〈項羽本紀〉、〈信陵君列傳〉、〈廉頗藺相如列傳〉、〈淮陰侯列傳〉、〈酈食其列傳〉等「皆肅括宏深，實敘事文永遠之模

¹⁶ 梁啟超，〈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〉，《飲冰室合集·專集》第四冊。

¹⁷ 梁啟超，〈義大利建國三傑傳〉，《飲冰室合集·專集》第四冊。

¹⁸ 梁啟超，〈作文教學法〉，《飲冰室合集·專集》第十五冊。

¹⁹ 梁啟超，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，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梁啟超卷》，頁235。

範」，或者表彰其特別能摹寫人物神態，尤其善以小事見性情，²⁰都在情理及預料之中。不過，要說「讀名人傳記，最能激發人志氣，且於應事接物之智慧，增長不少」，²¹司馬遷其實不如普魯塔克更為本色當行。梁啟超所撰大量古今中外的人物評傳，基本上都以思想性、知識性見長，大處著眼，外加激動人心的抒情及議論。至於精妙的細節、入微的刻畫，不能說全然沒有，但確實非梁傳的主要特徵。這是因為，梁啟超所追摹的，主要並非歷代文人奉為圭臬的司馬遷，而是「以悲壯淋漓之筆，寫古人之性行事業」的普魯塔克。

說到「悲壯淋漓之筆」，自是不能不提及梁啟超極負盛名的「新文體」。在我看來，「新文體」之「筆鋒常帶情感」，「條理明晰」、「平易暢達」、



1911年梁啟超在台中公園與標社同仁合影

（左二為林獻堂，左五為梁啟超）

「時雜以俚語、韻語及外國語法」等特點，固然在〈少年中國說〉、〈呵旁觀者文〉、〈過渡時代論〉、〈新民說〉等政論中得到很好的落實；而上述〈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〉、〈義大利建國三傑傳〉以及〈南海康先生傳〉等史述，同樣符合梁啟超對於「新文體」的界定。論者因主要關注「新文體」對於桐城古文、六朝駢儷或八股文章的挑戰，還有如何接引新術語和外國語法，不免重議論而輕敘事，相對忽略梁氏或長或短、或中或外的人物傳記。

鄭振鐸注意到〈南海康先生傳〉、〈李鴻章〉、〈袁崇煥傳〉、〈王荊公〉、〈義大利建國三傑傳〉等「都是火辣辣的文字，有光有熱，有聲有色的；決不是什麼平鋪直敘的尋常史傳而已」，可限於體例，還是將其作為「歷史著作」，與代表「新文體」實績的政論文章區分開來。²²錢基博撰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，定梁啟超文體演變為六階段，從少年時代的學桐城，到後來的學漢魏，再到「新民體」之「晰於事理，豐於情感」，這前三段基本依據梁氏自述。從第四段起，方才見出錢氏的眼力：〈國風報〉時期梁文「已臻潔淨，樸實說理，不似《新民叢報》之渾

²⁰ 梁啟超，〈要籍解題及其讀法〉及〈作文教學法〉，均見《飲冰室合集·專集》十五冊。

²¹ 梁啟超，〈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〉，《飲冰室合集·專集》十五冊。

²² 參見鄭振鐸，〈梁任公先生〉，《小說月報》20卷2號，1929年2月。

灝流轉，挾泥沙俱下；然排比如故，冗長如故」；民國既建，海外歸來，因與林紓、陳衍、易順鼎等相過從，梁氏「述志言情，間出儷體」；晚年專心講學與著述，且與新文化人胡適等交往，舍詩古文辭不為，而時時為語體文。²³ 錢先生的分辨頗為精細，只可惜囿于「文章」的觀念，不將「史著」納入論述的視野。

作為「史界革命」的發軔之作，《新史學》之〈論書法〉，固然涉及傳記、通史等著述體例問題，可所謂「悲壯淋漓之筆」、「發揚蹈厲之氣」，指向的卻是文章。這也難怪，〈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〉固然被作為文章廣泛傳誦，即便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當初也是作為文章來認真經營的，只不過因「下筆不能自休，遂成數萬言」，²⁴ 方才獨立城書。私心以為，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乃梁啟超所撰最為成功的兼及「著述」與「文章」的代表作。

梁啟超平生撰述，早期主要是政論，後期則以史著最為出色。這當然只是概而言之，比如其對於評傳的興趣，便始終沒有改變。可研究者之表彰梁氏「文章」，大都集中在前期的政論，而不太涉及後期的史學著述。反而是在梁啟超剛去世時，有徐凌霄、謝國楨、鄭振鐸三文，為其後期撰述作了專門的辯解。如報人彬彬（徐凌霄）的〈梁啟超〉稱：

世人所認為真正之梁文，大抵皆以《新民叢報》所作為標準也。其用語體文於學術之講演，及整理舊藝之著作，亦出於自然。以新語體自有顯白條理之特長。此系實用問題，貴得其便。章士釗遽譏其阿附後生，降抑身分，則所見甚陋。此只是工具之運用耳。苟于宣意達詞為便，區區人我之界先後之分又何足論哉。²⁵

謝國楨作為及門弟子，其〈〈論七略別錄與七略〉跋〉的口氣，似乎略嫌誇張：

按先生少年之文，以豪邁勝；及夫壯年治學，以系統條理見長，故恒亦有疏忽之愆；及夫晚年，則由提要鉤玄，一變而為精湛纖密之作，而文則情韻不匱，真迫東漢。²⁶

新文學家鄭振鐸的〈梁任公先生〉固然著重褒揚梁啟超《新民叢報》時期的撰述，但也不忘其後期寫作。鄭先生並沒有否認梁啟超歸國後的撰述文字風格與前不同，但頗有偏愛「雄奇」但不薄「恬淡」的意味：

他的文字已歸於恬淡平易，不復如前之浩浩莽莽，有排山倒海的氣勢，窒人呼吸的電感力了。讀《新民叢報》的文字，我們至今還要感到一種興奮，讀近年來的梁氏文字，則如讀一般的醇正的論學文字，其所重在內容而不在辭章。

²³ 參見錢基博，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86年），頁383-407。

²⁴ 〈清代學術概論·自序〉，見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梁啟超卷》，頁123。

²⁵ 彬彬（徐凌霄），〈梁啟超〉，原載1929年1月26-28日〈時報〉，見夏曉虹編《追憶梁啟超》（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19。

²⁶ 謝國楨，〈〈論七略別錄與七略〉跋〉，原載1929年3月5日天津〈益世報〉，見夏曉虹編《追憶梁啟超》，頁426。

古今
論衡

對於梁啟超之追隨時代變化，改用白話寫作，風格由「氣勢雄健」一改而成「舒徐婉曲」，鄭振鐸認為，這並沒有什麼不好，反而是「此可見梁氏始終是一位腳力輕健的壯漢，始終能隨了時代而走的」。²⁷

1930年代以後，隨著中國現代學術的健康發展，梁啟超的許多具體研究成果被超越，而其「筆鋒常帶情感」，當初乃「新史學」的催化劑，如今則成了「不夠專業」的象徵。其論述之隨意、考證之粗疏，借用外來學說時之一知半解，使得作為「學者」的梁啟超，日漸遠離中國學界的主流。

倒是史家錢穆的一則私人通信，重新激起我們對梁啟超的強烈興趣，不過，這回不是「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」，而是其述學文體。1960年5月，錢穆給時正負笈哈佛的得意門生余英時寫信，稱「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」，其中專門表彰梁啟超的述學文字：

梁任公於論學內容固多疏忽，然其文字則長江大河，一氣而下，有生意、有浩氣，似較太炎各有勝場，即如〈清代學術概論〉，不論內容，單就其書體制言，實大可效法。近人對梁氏書似多失持平之論，實則在五四運動後梁氏論學各書各文均有一讀之價值也。²⁸

這裏強調的是梁氏的「論學」，而且專門點出撰於五四運動後的各書各文，正可與上述鄭振鐸等人的說法相呼應。也就是說，事隔三十年，任公先生的「文章」重新引起關注，而且是一位頗為挑剔的史學家的關注。

又過了三十年，1990年代的中國學界，梁啟超的名字再次大放光彩。世人有欣賞其立憲政治的，有追慕其文學改良的，有發掘其國文教育主張的，更有表揚其引進外資思想的。任公先生本就興趣廣泛，言論駁雜，對當世的幾乎每個重大問題都發表過意見，於是，反省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，任公先生成了最佳的入口處。但毋庸諱言，今日世人之普遍關注梁啟超，與其「平易暢達」的著述文體不無關係。這裏所說的文體，既包括前期「時雜以俚語、韻語及外國語法，縱筆所至不檢束」的「時務文體」，也包括後期以白話為主的「醇正的論學文字」。



1911年梁啟超與長女梁思順
赴臺灣時在笠戶丸船上合影

²⁷ 鄭振鐸，〈梁任公先生〉，《小說月報》20卷2號，1929年2月。

²⁸ 〈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〉，見余英時著《猶記風吹水上鱗——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》之「附錄」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1年）。

三、「極宜著意修飾」的「論學文字」

在同一封論學書劄中，錢穆還分別表揚了章太炎、陳垣、胡適等人的述學文體，並對王國維的考據文字「繁重處只以輕靈出之，驟讀極易領略，細究實多罅漏」，以及陳寅恪的「冗選而多枝節，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之三四始為可誦」，²⁹頗多非議。以下引征此信，並略做注解與發揮。

錢穆論學宗旨與胡適不同，可這並不妨礙其欣賞胡文。所謂「胡適之文本極清朗，又精勁有力，亦無蕪詞，只多尖刻處，則是其病」，³⁰大體準確；只是「尖刻」二字，在我看來，與適之先生的為人為文均不大能對上號。1920年代，陳西滢評選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，不選《嘗試集》，也不選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，而選相對龐雜的《胡適文存》。³¹胡適本人對這一選擇很不滿意，稱「西滢究竟是一個文人」。³²其實，《胡適文存》中的長篇論文，與其哲學史、文學史專著，同屬述學文字，沒必要過分拘泥。1940年代，朱自清曾專門撰文，指導學生閱讀《胡適文選》：「他的散文，特別是長篇議論文，自成一種風格，成就遠在他的白話詩之上。他的長篇議論文尤其是白話文的一個大成功。」³³這段話，基本上可移用來評價胡適的專業著述。

胡適的述學文章很受歡迎，當初影響極大，可這並非「無心插柳」。作為學者，胡適對於文章的經營，確實是很下了一番功夫。在〈科學的古史家崔述〉中，胡適徵引崔述35歲那年自陳有志著述而先從熟玩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三篇文章入手的書信，然後大加發揮：

他這一番工夫實在不曾白費掉；他雖不以文名，但他的文章在清朝古文之中要算是第一流的了。和他同時的史學家，章學誠也講究文章，故能自抒所見；那作〈王荊公年譜考略〉的蔡元鳳因為文筆煩冗，便令讀者生厭了。又如近代廖平與康有為，同治今文學；康的思路明晰，文筆曉暢，故能動人；廖的文章多不能達意，他的著作就很少人能讀了。要知文章雖是思想的附屬工具，但工具不良，工作也必不能如意。崔述於著作之先，力求能「自抒所見」的預備，這一層很可以做後人的模範。³⁴

學問家之為了能「自抒所見」而著意經營文章，與文學家之專注於文學創作，其實還是很有區別的；而廖平與康有為對近代中國思想界影響的大小，也不全然是文章的緣故。但胡適對於「述學文體」的理解與刻意經營，還是值得認真琢磨。³⁵

至於說到陳垣的「其文樸質無華，語語必在題上，不矜才，不使氣，亦是論

²⁹ 〈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〉，見《猶記風吹水上鱗——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》，頁253。

³⁰ 〈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〉，見《猶記風吹水上鱗——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》，頁254。

³¹ 陳源，〈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〉（上），《西滢閒話》（上海：新月書店，1928年），頁335。

³² 〈整理國故與「打鬼」〉，《胡適文存三集》第二卷（上海：亞東圖書館，1930年），頁213。

³³ 〈《胡適文選》指導大概〉，《朱自清全集》第二卷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頁299。

³⁴ 〈科學的古史家崔述〉，《胡適文集》第七卷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176-177。

³⁵ 參見拙文〈胡適的述學文體〉，《學術月刊》2002年7、8期。